

寻访武汉城内的“徐州城”



从轻轨上眺望徐州新村 本版摄影 快报记者 辛一

最近,一位读者向《发现》周刊爆料称,多年前他到武汉出差时,发现武汉有个叫徐州新村的地方,这里住着一群徐州人,他们都来自江苏徐州,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徐州话,吃的也大都都是徐州典型的面馍馍。这群人和周围的居民形成鲜明对比,在武汉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为什么在武汉会出现这样一群徐州人?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迁徙到这里?为什么多年下来还保持着“徐州风”?带着疑问和好奇,记者近日前往武汉一探究竟。

□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戎丹妍

寻访徐州新村

这里有条名为徐州路的巷子

在去武汉前,记者先在谷歌地图上搜索了“徐州新村”这个地名,发现武汉真有这样一个地方,位于武汉江岸区的东北角,就紧靠着长江,并且靠着武汉唯一一条轻轨线,这条轻轨上也有“徐州新村”这一站名。打探好了地方,记者向武汉进发了。

在宾馆收拾整顿好后,记者就向当地人打探怎么去徐州新村。当地人告诉记者,公交车和轻轨都有徐州新村这一站,一下车就到了。不过记者住的地方离轻轨有一段距离,坐公交车更加方便。大约过了20多分钟,汽车到达“解放大道徐州新村站”。

下了车后,记者看到这里没有了江边的繁华,很多地方在建设,面前是一大片待建设的荒地,而荒地旁边有个老小区,应该就是要找的徐州新村。沿着车站往前走了一段后,出现了一条小巷子,记者拐了进去,走到头发现一栋楼上的标牌就是“徐州二村”,就是这里了。

楼下正好聚集着一群居民在择菜、聊天,记者上前问他们

是不是徐州人,但他们用一口武汉话告诉记者,他们都是武汉人。他们说有很多徐州人住在这里,但大多住在“徐州三村”,记者又往前寻找徐州三村。

走在一片老小区,发现这里的小区建筑非常有特色,虽然外墙已经斑驳,但却有一种历史沧桑感,他们的阳台大都是露天的,不像南京这边喜欢用防盗窗玻璃把阳台封闭起来,即使封也是用的那种有雕花的黑色铁栏杆,防盗窗也是用黑色铁栏杆,外面再摆放几盆花草,显得非常文艺。很多窗台上的花都开了,一路走过去,都是风景。

很快记者就走到了一条名为“徐州路”的巷子里,这里沿街都是杂货铺,还有小商贩走街串巷的叫卖声,有点南京老城南的味道。在一个十字交叉路口,记者看到了“徐州三村”的楼牌,这里有几栋楼房因年久的缘故已经泛黑。楼下是很多小吃店,有卖米粉的、卖糕点的……此时已是傍晚,街上行人渐多,有买晚饭的,还有收衣服的。

三个爱吃馍的徐州人

1.嫌吃米饭麻烦,觉得吃面食更快的老徐州



一起打牌聊天。

在一栋看起来比较新的徐州三村楼下,记者看到了几个在打牌的老人,听其中几个讲话似乎不像本地人,于是记者上前询问他们是不是徐州来的,一问果然,其中有两个老人都是徐州来的。

年纪较长的老人名叫周瑞洪,今年77岁,他告诉记者他是15岁那年来到这里的。当时正在念初中,他的哥哥因为工作调动要来武汉,并且可以带家属,于是他就跟随哥哥嫂子一家来了武汉。

周瑞洪说,哥哥原本在徐州铁路工厂当机械工,在1950年这年,工厂因为要搬迁,哥哥也在搬迁名单内,所以就只好跟随大家一起过来了。当时一起来的徐州人大概有几百号人,一行人浩浩荡荡从徐

州火车站出发,坐了3天3夜的火车来到这里。当时的火车没有现在快,而且还要绕道从郑州换车才能到武汉,一路非常辛苦。

刚刚到武汉时,这里什么也没有,就只有几十排用竹子和泥巴糊成的平房,根据每家的人口分房子住,一般一家只分到一间,稍微人多的家庭就分到一间半。因为靠着江边,一到发大水季节,这里就遭水淹。后来,工厂又重新盖了一批新房,这回是用红砖砌成的,质量稍微好一点,一直住到上世纪90年代,他们才换了楼房住,也就是现在他们住的楼房。

周瑞洪回忆,刚到武汉时,他考进了铁路办的汉口铁中。当时初中毕业已经算学历不错的,而且好找工作,“比现在的大学生好找工作多了。”老人笑着说。因为是铁路家属,周瑞洪也不例外地进了铁路工厂,也就是哥哥所在的“江岸车辆厂”。

刚开始周瑞洪被分去当会计,但在那个工人吃香的年代,周瑞洪听说自己是去当会计后反而不高

兴,于是他就主动跟领导反映自己要当机械工。领导拿他没办法,最后只好调他到生产一线当工人,工种是“刨工”。

周瑞洪看上去就是个性格开朗的人,有着徐州人的豪爽劲。他说他很快就适应了武汉人的生活,和当地人打成一片。除了饮食不太适应外,其他都可以适应。周瑞洪说,武汉人是南方人,喜欢吃米饭,而他们徐州人喜欢面食,因为面食做起来快。比如吃面糊、面疙瘩这些食物,只要拿点面粉搅和,然后拿筷子往滚水里挑就可以了,煮一会就能吃。而米饭和米粉就不同了,吃起来太麻烦。“米饭要煮半天,米粉还要专门去买。”周瑞洪说。

这时在一旁的沈启玉老大爷也按捺不住了,他说吃米饭没有“嚼劲儿”,哪有徐州的馍馍有“嚼头”。徐州人管馒头叫馍馍,而摊的饼叫“烙(徐州人读luo)馍”。沈启玉说:“徐州北边吃煎饼,南边吃烙馍。所以我们很少吃煎饼,都吃烙馍。”

2.老伴不在了,烙馍的锅也生锈了



沈启玉比周瑞洪小3岁,今年74岁。他1955年来到武汉。他哥哥1950年调来武汉,安顿好后才接他过来。沈启玉说,开始他和父母一起在徐州乡下住,后来为了有份好工作,于是就跟着哥哥到武汉来了。当时他也是先考汉口铁中,考进了才能留下来,当时能考到铁中,就等于找到“铁饭碗”了。幸运的是他考上了,毕业后也当上了车辆厂工人。

说到徐州人的吃时,沈启玉还特意从家里拿来一口专门烙馍的锅演示给记者看,但这个锅已经废弃了,因为做馍的人已经不在。他说这个锅是当年专门从徐州带过来的,因为武汉没有,当时很多吃饭的家伙都是从徐州带来的。每

个徐州人家里都有这样一口锅,但周瑞洪说他家早就扔掉了,因为摊烙馍的炉子必须在地上生火,但现在都是楼房,哪可能在地板上搭个灶台烙馍吃呢?所以就扔了。

不过沈启玉说,前几年他还看到有个徐州人跑到院子里生火做烙馍吃,大概是憋不住太想吃了。沈启玉说,其实在五六年前,如果要吃馍还是可以的,小区里有个80多岁的徐州老太太就经常出来摆摊卖烙馍,但这两年已经看不到这个老太太了,可能身体不好,或者不在了。

沈启玉的妻子也不在了,所以烙馍的锅也就闲置了,他的妻子也是徐州人,如今锅上已经锈迹斑斑。

这些徐州老人都说,他们的孩子都不会做徐州的面食了,而且他们也吃惯了武汉的米饭、米粉,反而吃不惯徐州的面食,所以“手

艺”就这么失传了。不过他们的口音还是保留了下来,在家里,年轻的徐州人都讲徐州话,但出了门,就都说的是武汉话了。而且很多晚辈也渐渐和武汉其他地方的人融合,娶了或嫁了别的地方的人。比如周瑞洪就娶的是河南的姑娘,他是属于开朗的人,很能和打成一片,而第一代过来的徐州人,大多还是嫁娶徐州本地人,因为语言和生活习惯相通。

周瑞洪说,刚来武汉的时候,他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回徐州看望父母和亲戚,也方便,因为他们坐火车都不要钱,每年都发12张票,所以回去的机会多,但现在渐渐已经失去了和徐州的联系。

现在他们的生活习俗也渐渐和武汉融合,嫁娶等仪式也都遵照武汉的习俗来,以前过年徐州人都吃饺子、馍馍等,现在也变得和武汉差不多了。

3.儿女们不愿学她的烙馍手艺



在徐州三村另外一栋楼房下面,记者遇到一位徐州老太太金广兰。金广兰说本来她和丈夫都在徐州的乡下种地,后来日子实在太苦,丈夫就找到在江岸车辆厂工作的哥哥,让他把他们带到武汉来,他们一家就在1954年过来了。如今金广兰已经81岁,但身体还很硬朗,除了听力有点下降外,精神还挺好。她现在和其中一个女儿住一起,聊天工夫还不停指挥女儿怎么煮汤怎么做饭。不过金广兰说,她的孩子都不喜欢做徐州饭

了,教她们做馍她们都不愿意,宁可出去买了吃。

在和金广兰聊天时,又来了一位她的邻居,看起来比较年轻,金广兰介绍说这个人也是徐州人,叫彭艳梅,今年51岁了。彭艳梅说的也是一口的徐州话,说话非常干练,她父亲也是从徐州来的,她是在武汉出生的。她说这栋楼里有不少徐州人,不过近年来渐渐从外面搬进来不少人,有些徐州人因为条件好或者别的原因搬走了,房子卖了,就住进来不少其他人了。

在临走前,记者到一家附近的小吃店吃饭,小吃店是一对年轻夫妇开的,但听口音不像本地人,于是记者问他们是不是徐州人。但老

板说他们不是徐州人,也不是武汉人,是其他地方来打工的。他还告诉记者面前几栋楼最老的房子里住的大多是外地打工的,因为这个房子房价比较便宜,所以来租房的外地人就很多。

到记者离开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走出徐州新村,外面又是另一个世界。这时已经华灯初上,不远处的高楼闪烁着霓虹灯,大马路上车来车往,非常喧嚣。相比之下,徐州新村就显得非常安宁,人们都回到自己的家里生火做饭,说着自己的家乡话,如果不走进他们的生活,你可能不知道这里还生活着一群来自徐州的异乡人。

(请杨先生领取报料费200元)



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剪发



徐州三村附近的徐州路



轻轨上的徐州新村站



烙馍渐渐变成了鸡蛋饼



江岸车辆厂原址大门



小区内徐州人爱吃的的面点